

【珞珈语言文学学术丛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当代文学与 国民性

樊 星◎著

一九

【珞珈语言文学学术丛书】

樊星◎著



当代文学与
国民性研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文学与国民性研究 / 樊星著 . —北京：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10

ISBN 978 - 7 - 5161 - 1240 - 3

I. ①当… II. ①樊…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
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71379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李炳青
责任校对 王兰馨
责任印制 张汉林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 文 域 名 :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3.5
字 数 326 千字
定 价 4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辑 当代文学与国民性研究

远离启蒙的文学现代派与世俗化浪潮	(3)
从“改造国民性”到理解民族性	
——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一条思想史线索	(25)
“启蒙的终结”与作家的批评立场	(50)
从“新启蒙”到“再启蒙”	
——“五四”九十周年祭	(62)
“改造国民性”的另一条思路	
——论当代作家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发现与思考	(77)
新时期文学与“新民族精神”的建构	(101)
当代文学对“国民性”的新认识	(123)
当代文学中的“农民性”问题	(138)
当代民粹主义思潮的流变	(159)
革命浪漫主义的精灵	(176)
“新史诗”、“新经典”与“新寻根”思潮中的民族文化精神	(196)

2 * 目 录

- 当代文化思潮中的“反智主义” (203)
30年来中国作家的政治关怀 (219)
关于国民性的笔记 (260)

第二辑 当代文学与神秘文化

神秘之境

- “当代小说与中国文化”札记之三 (269)

当代神秘潮

- 当代中国作家的人生观研究 (283)

叩问宗教

- 试论当代中国作家的宗教观 (305)

- “新生代”文学与传统神秘文化 (327)

- 当今女性文学与神秘主义 (347)

- 当代陕西作家与神秘主义文化 (370)

贾平凹：走向神秘

- 兼论当代志怪小说 (378)

- 范小青与当代神秘主义思潮 (394)

“风马牛也相及”的故事

- 关于一种“哲理小说”的笔记 (407)

关于文学与萨满教的笔记

- 东北文学研究一得 (417)

- 后记 (427)

第一辑

当代文学与国民性研究

远离启蒙的文学现代派与 世俗化浪潮

启蒙，是 20 世纪中国思想的一个重要主题。从“五四”运动呼唤“科学与民主”到“文化大革命”以后以破除“现代迷信”为核心的思想解放运动（所谓“新启蒙”），作为现代化开路先锋的知识分子前赴后继，谱写了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光辉篇章，也为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看待两次现代启蒙运动的终结？

在当代学界，关于世纪初启蒙运动的终结，李泽厚先生关于“救亡压倒启蒙”的论断曾在 20 世纪 80 年代影响巨大。这一学说既总结了历史的教训，也为当代“新启蒙”运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在总结、反思 20 世纪 80 年代思想遗产的浪潮中，一批深受现代西方“后现代”思潮影响的学者宣告了“新启蒙”的终结，其中，张颐武的有关论述是很有代表性的：“海子之死加上（19）89 年中国美术馆的枪击事件构成了整个时代的背景：新时期那套话语的合法性终结，不仅因为政治变动，时代本身也发生了转变。启蒙的、现代性的话语原来的意义已经枯竭。‘后新时期’是一个在商业化和大众传媒支配下多元话语形成的时期……精英文化

既丧失政治合法性，又丧失文化合法性”，因此只好“放弃整体目标，放弃启蒙的任务”。^① 这样的说法为许多青年学子所认可。

也就是说，在20世纪的前半叶，是救亡压倒了启蒙；到了20世纪末，又是商业化（其实也就是现代化）压倒了启蒙。如此说来，启蒙的影响力为什么那么有限？一个可能的答案也许是：启蒙是知识分子的事业，而知识分子在中国的人口总数中一直是少数。以少数人的呐喊去改变多数人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常常不那么容易（虽然知识分子在人类历史上一直扮演了不断改革、改善人类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向导角色）。但问题不止于此。现实矛盾的错综复杂，常常只有在时过境迁以后才渐渐显示出来。

现代主义的冲击

20世纪80年代，是启蒙浪潮再度高涨的年代。但是，在多元化的思想文化格局中，启蒙只是其中的一元。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启蒙主张从一开始就遭遇了具有虚无主义色彩的现代主义的冲击。

作为一种追求文学创作新思维的文学思潮，现代主义一开始似乎只是以新的观念、新的手法引人注目的。以北岛、舒婷、顾城等人为代表的“朦胧诗人”和以王蒙的“意识流”小说为代表的“新潮小说”开辟了中国文学发展的新空间。与此同时，

^① 引自袁幼鸣《诗人何为——’93中国“21世纪新空间”文化研讨会综述》，《钟山》1994年第2期。

虚无主义的浪潮也随着文学新潮一起进入了当代人的思想视野，动摇着长期以来占据了主导地位的乐观主义世界观——在北岛的《一切》中，充满了悲凉的叹息：“一切都是命运/一切都是烟云/……一切语言都是重复/……一切信仰都带着呻吟……”这首诗曾经触发了舒婷的《这也是一切》：“不是一切呼吁都没有回响；/不是一切损失都无法补偿；不是一切深渊都是灭亡/……不是一切心灵/都可以踩在脚下，烂在泥里；/不是一切后果/都是眼泪血印，而不展现欢容。”可舒婷也写过十分无奈的诗篇《墙》：“我无法反抗墙，/只有反抗的愿望。”“我是什么？/它是什么？很可能/它是我的渐渐老化的皮肤，/既感觉不到雨寒风霜，/也受不了米兰的芬芳。/还有可能/我只是株车前草，/装饰性地寄生在它的泥缝里，/我偶然，它必然。”还有“童话诗人”顾城，也在《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中写下了这样的怅惘：“我在希望/在想/但不知为什么/我没有领到蜡笔/没有得到一个彩色的时刻/我只有我/我的手指和创痛/只有撕碎那一张张/心爱的白纸/让它们去寻找蝴蝶/让它们从今天消失。”这些伤感而无奈的叹息，在启蒙思潮高涨的 20 世纪 80 年代也并不稀少。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应该都还记得，记得潘晓的叹息——“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记得那些引起过争议的电影、剧本和小说《苦恋》、《在社会的档案里》、《假如我是真的》、《飞天》中那沉重的绝望，记得报刊上关于“信仰危机”的讨论……其中有对于苦难历史的悲叹，也有对西方虚无主义的认同。尽管这种虚无主义的情绪常常受到“主旋律”的批评和打压，但并没有、也不可能烟消云散。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随着“新潮文学”的进一步风起云涌，以韩少功的《爸爸爸》、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等作品为代表的“新潮小说”和以 1986 年《深圳青年报》、安徽《诗歌报》共同推出的

“中国诗坛 1986 现代诗群体大展”为代表的“现代诗”潮流，不约而同地强化了虚无主义的时代主题。一直到“新潮小说”退潮以后，紧跟而上的“新写实小说”仍然继承了虚无主义的主题，以一批描写“烦恼人生”无边苦闷的作品表达了对虚无主义的认同。如果说，“朦胧诗”中的虚无主义情绪还散发着“小资情调”的气息，那么，“新写实小说”则充分宣泄了老百姓生活的苦闷与无奈。刘震云的《一地鸡毛》、池莉的《烦恼人生》写出了“活着”的烦恼与无意义；方方的《风景》、余华的《现实一种》解构了“家”的温馨，展示了家庭暴力的残酷；苏童的《妻妾成群》、《红粉》消解了“女神”的神话，剖析了女性心理深处的阴暗；他的《刺青时代》、《黑脸家林》和刘恒的《逍遥游》、《黑的雪》则质疑了“童心”的传说，还原了少年的喧哗与骚动……一时间，虚无主义的浪潮大涨。虽然从文学创作手法的角度看，“新写实小说”是对“新潮小说”的反拨，同时也是对现实主义的回归，但从格调和精神这个角度看，“新写实小说”明显继承了“新潮小说”的虚无主义内核，并以更加惊世骇俗、更加审丑溢恶的风格将那虚无主义又向极端的方向推进了一大步。

而既然生命的意义是虚无，那么“启蒙”又有什么用？当年，鲁迅在 1927 年“大革命”失败以后深刻反思了启蒙的悲哀，把自己的启蒙比作“帮助”、“排吃人的筵宴”：“中国的筵席上有一种‘醉虾’，虾越鲜活，吃的人便越高兴，越畅快。我就是做这醉虾的帮手，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① 话虽有愤

^① 《答有恒先生》，《而已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41 页。

激之嫌，却不无深刻之见。这样的深刻之见一方面显示了鲁迅在启蒙与绝望之间的无尽彷徨，另一方面也的确写出了思想启蒙的悲哀：启蒙给许多人带来的痛苦，常常为启蒙者始料未及。而启蒙者因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常常发出的愤激之辞、绝望之语，也常常在道出了人生的残酷与无奈的同时，暴露了启蒙思想的阴暗一面：在“改造国民性”思想的深处，无疑有民族虚无主义的阴影；而在如何“改造国民性”的问题上，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展开的错综复杂的残酷斗争也使我们的民族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而在倡导“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思潮中，也存在着民主与个性的矛盾（“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民主”就是戕害个性的黑幡，更不要说“民主集中制”导致的一幕幕权力斗争的悲剧），还有崇尚科学与宗教信仰自由之间的矛盾、开发自然与保护环境之间的矛盾等问题。其中许多问题，是现代化运动也解决不了的。也正因为有如此错综复杂的矛盾与斗争、代价与教训，才使得虚无主义一直有着比较广阔的市场——从鲁迅、周作人到北岛、韩少功，一直绵绵不绝。连性情温和、追寻信仰的史铁生在1986年末也已经明白：“不知道上帝把什么给藏起来了。谁也不知道”，于是活着的意义就在于“在命定的路上行走”（中篇小说《礼拜日》）；连曾经写出过《北方的河》的当代理想主义代表人物张承志也在1989年的中篇小说《西省暗杀考》中终于发出了绝望的叹息：“刚烈死了。情感死了。正义死了。时代已变，机缘已去”，他只好自比为“一朵错开的花”（中篇小说《错开的花》）；而在“寻根派”韩少功看来，“真正伟大的人格就是既看透了一切又充满着博爱”，他眼中的鲁迅就是典范：“他看透了很多事情，有时装糊

涂，有些事情看起来没有意思，可他还是去办。”^① 他的中篇小说《爸爸爸》就是通过一个种族的衰落揭示这样的主题：“理性和非理性都成了荒诞，新党和旧党都无力救世。”^② 在当代作家的阵营中，史铁生、张承志、韩少功都是知青出身，都比较注意坚守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也都不像北岛那样寒气逼人。他们的作品，或充满博爱的温情（如史铁生），或张扬浪漫的激情（如张承志），或富有理性的思想（如韩少功），但即使如此，他们也不能不直面惨淡的人生。由此可见，虚无主义力量的强大。

就这样，“现代派”在给当代中国文坛带来了创新的活力、多元化的格局的同时，也将迷惘、苦闷、绝望、疯狂的虚无主义情绪带入了中国。这样的情绪像瘟疫一样在充满青春期苦闷的青年中迅速扩散开来，并将“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一度洋溢于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启蒙主义使命感、理想主义上进心冲了个七零八落。就像美国思想家丹尼尔·贝尔在批判现代主义文化、后现代主义时谈到的那样：“……现代主义文化——承接了同魔鬼打交道的任务。可它不像宗教那样去驯服魔鬼，而是以世俗文化（艺术与文学）的姿态去拥抱、发掘、钻研它，逐渐视其为创造的源泉。”而且，“今天，现代主义已经消耗殆尽……反叛的激情被‘文化大众’加以制度化了。它的试验形式也变成了广告和流行时装的符号象征”。而“各式各样的后现代主义（它们以幻觉拓展意识的无穷疆界）仅仅是在对个性

① 引自林伟平《文学和人格——访作家韩少功》，《上海文学》1986年第11期。

② 韩少功：《答美洲〈华侨日报〉记者问》，《钟山》1987年第5期。

的抹杀中努力分解自我”^①。这里，现代主义文化呈现为一种深刻的悖论：一方面，它是现代文化的产物，它是在现代社会的重压下个性发出的尖叫，它对现代社会的批判既尖刻又变态；另一方面，它又因为找不到出路，或者是在上下求索都碰壁的情况下彻底放弃了变革现实的想法，而在封闭自我、消磨自我、放纵颓唐的情绪中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文艺手法的变革中。回眸文化发展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以启蒙主义为先锋的现代思想在成功唤起了现代人的个性意识以后不久就遭遇了那些崇尚叛逆、颓废放荡的个性的狙击。而个性在现代化社会体制下被异化、被挤压的痛苦也进一步凸显了个性的脆弱与无助。启蒙运动唤起了人类的个性意识，但个性的脆弱与无助与人性中的其他弱点（诸如妄自尊大、排斥异己、贪婪、嫉妒、懒惰，等等）一起，又在现代社会遭遇了新的困境。

而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从“人性恶”的角度质疑过启蒙思想。在他那部著名的《地下室手记》中，他告诉人们：“是谁第一个宣告，说人只是因为不知道自己真正的利益，所以才做坏事的；又说如果给他以启蒙，让他看到真正的、正常的利益，那么他便会立即停止干坏事，便会立即成为善良的和高尚的人，因为他既受了启蒙，并懂得了自己真正的利益，因此就会看出在善的里面有他自己的利益，而大家知道，没有一个人会因为故意反对本身的利益而行动……”可作家却指出：“无数事实证明，人们明明知道，也就是说，完全懂得自己的真正利益所在，却把它们置之脑后，反而奔上另一条道路去冒险、去碰运气……可见这种固执和任性的确对他们比一切利益更为愉快。”这里的

^①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65、66、75页。

问题是理性主义的启蒙思想回避不了又解决不了的。因为，“这可就是整个的心理学了呀”。人心的深不可测，人心的瞬息万变，人心的难以理喻，人心的犹豫彷徨，常常是启蒙理论难以对症下药的。

笔者无意低估启蒙思想在人类思想史上发挥过的巨大推动作用。但就像任何思想都不可能无懈可击，也不可能永不退色一样，启蒙思想也有启蒙思想的盲区和误区。正是这些盲区和误区的存在与难以消除，才有了非理性主义（现代派的主要思想武器）的崛起与流行。而非理性主义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相当有力地改变了人类的文化观念和思想意识，也足以表明启蒙主义的脆弱。我想，这很可能与启蒙主义的知识分子气质有关吧。启蒙主义，是一种知识分子的理论主张，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和理性主义色彩。但在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与大众的文化习俗之间，常常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不错，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的时刻：知识分子在启蒙思想的鼓舞下，深入民间，唤起民众，并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社会。但这样的事情常常发生在那些非常时期（例如19世纪的俄国民主主义运动和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民主主义革命运动）。而且，在那些非常的历史时期，启蒙思想在普及的过程中也常常是发生了深刻的变异的。知识分子对大众传播的那些启蒙思想常识常常是要经过大众的检验与选择的，而这检验与选择又常常是要经过他们的传统文化观念的过滤的。因此，大众对启蒙思想的接受就常常是打了折扣的。民间传统文化观念的根深蒂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启蒙思想的动摇与颠覆，是很值得打个问号的。经过现代启蒙风雨的冲洗以后，西方宗教文化的依然稳固，中国民间儒家礼仪、道教迷信、佛家信仰的深入人心，都是例证。

也许，这不应该仅仅被看作是知识分子文化的悲哀，这其实

也是人类的本性的悲哀。

回到我们的话题上来。“新潮文学”就这样有力狙击了新时期启蒙运动的深入发展。由于“新潮文学”的那套话语过于西化，虽经期刊界、评论界和书商的大力炒作，也终于在“个性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并因为远离大众的“先锋”姿态而受到了大众的冷遇。这样，在现代化进程中，“新潮文学”只短暂地热闹了几年（其高潮只在1985—1986这两年间），就不得不让位给了“新写实小说”和“通俗文学”。

前面说过，“新写实小说”在精神实质上是继承了“新潮文学”的虚无主义内核的。另一方面，“新写实小说”贴近百姓生活的姿态又是世俗化浪潮高涨的重要标志。下面，我想从当代文学的世俗化思潮这个角度，来回顾一下当代作家走近大众（但决不再是为了启蒙，而是认同世俗生活价值观）的大概旅程，看看他们是如何悄悄离开启蒙的旗帜的。

世俗化思潮的冲击

中国一向是世俗观念深入人心的国度。就像钱穆先生说过的那样：“中国文化是一种现实人生的和平文化，这一种文化的主要泉源，便是中国民族从古相传一种极深厚的人道观念。”^① 儒家讲“经世致用”，道家讲“逍遥”、“养生”，进退之间，全在世俗生活。又因为“经世致用”的道路格外坎坷，所以绝大多数平民百姓是立足于把“小日子”过好的。他们从儒家那里拿来了“温柔敦厚”的“礼教”，以维护正常的社会

^①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50页。

秩序。他们更多的是认同道家的处世哲学的，对怎样“逍遙”，如何“养生”，有一系列的讲究。正如钱穆先生所云：“中国人生活上的最长处，在能运用一切艺术到日常生活中来，使生活艺术化……纵使吃饭喝茶，最普通最平常的日常人生，中国人也懂讲究。”“中国文化精神便是要把外面大自然和人的内心德性天人合一而艺术化，把自己生活投进在艺术世界中，使我们的人生成为一艺术的人生，则其心既安且乐，亦仁亦寿。”^①盛世不用说了。就是在乱世，中国人也常常是善于逍遙处世的。“文化大革命”中，在“造反派”和“保守派”你死我活的斗争之外，还有看淡了政治斗争的“逍遙派”，在那里静心养生、研究烹饪、打家具、学外语。正是这一批政治热情不高、爱惜自己羽毛的人们，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悄悄守护了传统文化的精神家园。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当大多数作家紧跟时代，痛定思痛，控诉“文化大革命”，反思历史的时候，是汪曾祺率先打开了“怀旧”的窗棂。他的《受戒》，既生动地再现了童年的美好生活，使人很自然地想到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和废名的《竹林的故事》、沈从文的《边城》那些“怀旧”之作，同时也妙趣横生地描绘了乡村和尚有妻子、有艳遇的世俗生活。汪曾祺为什么能在思想解放的启蒙浪潮中别开生面，复兴了“怀旧”的浪漫文学传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不问政治”^②。

^① 钱穆：《中国文化十二讲》，引自沙莲香主编《中国民族性》（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59—260页。

^② 林斤澜语，引自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8页。